

现为：部分党员、干部理想信念不坚定，不信马列信鬼神；对党不忠诚；部分地方存在拉票贿选现象；“四风问题”^①比较严重；纪律松弛、滥用权力、腐化堕落、买官卖官、跑官要官、任人唯亲、独断专行、贪污受贿、弄虚作假、脱离群众、违法乱纪等现象滋生蔓延^②。习近平同志将这些问题和矛盾集中概括为“七个有之”^③和“十个主义”^④。这些问题和矛盾，使党的思想道德基础受到严重侵蚀，党内政治生态和党的形象受到严重损害。要解决这些问题和矛盾，必须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党内监督，在监督体系、监督合力以及监督任务和内容上采取各种有效措施，解决党内监督缺位的问题，进而维护党的团结统一。

十八届六中全会“党的领导核心”确立的历史比照和现实观照

管新华*

作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有机整体的逻辑构成和协调推进的自然节点，继三中全会聚焦全面深化改革、四中全会聚焦全面依法治国和五中全会部署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十八届六中全会则重点研究全面从严治党。在总结十八大以来“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实践历程和成果经验的基础上，从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辩证统一的高度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强化党内监督和完善顶层设计，内容丰富、成果丰硕，而最具标志价值和深远影响的则是正式将习近平同志确定为党中央的核心和全党的核心。这在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历史中并不是第一次，但绝对是具有鲜明特征的一次，必须置于历史维度比照。

一、十八大以前党的领导核心确立的历史背景和基本经验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众多政党和团体中脱颖而出并被近现代中国历史和人民所选择，之所以能够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等“三件大事”，原因固然是复杂和多元的，但更为本质的正如习近平同志在建党95周年纪念大会上阐述的“95周年来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

①“四风”指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

②《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第43页。

③“七个有之”即搞任人唯亲、排斥异己的有之，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的有之，搞匿名诬告、制造谣言的有之，搞收买人心、拉选票的有之，搞封官许愿、弹冠相庆的有之，搞自行其是、阳奉阴违的有之，搞尾大不掉、妄议中央的也有之。

④“十个主义”即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好人主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拜金主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

*法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中心副教授，210023。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总书记意识形态建设系列重要讲话的理论贡献和实践要求研究”（15ZDA002）的阶段性成果。

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同中国人民接续奋斗的结果”，特别是“以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

1. 改革开放前党的领导核心确立的历史背景和基本经验。自1921年成立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着手解决和选择确立领袖集团和领导核心，虽然领导体制和称谓职权不断优化调整，但总体进程极为曲折，直至遵义会议至延安整风中最终选择毛泽东同志。

在标志中国共产党诞生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除了确定党的名称和党的纲领之外，大会还选举产生了由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等三人组成的中央局，其中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而陈独秀担任书记，这是当时的最高职位。从此，党的第一个中央机关由此产生。然而，由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导致了第一次革命战争的失败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一次重大失败，所以在1927年8月7日于汉口召开的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上，陈独秀的职务被撤销、领导权力被剥夺，中国共产党寻求领导核心的第一次努力宣告失败。而在“八七会议”上新进中共政治局常委会的瞿秋白被委以重任，开始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直到党的六大期间，“新常委瞿秋白成为了实际上的领袖”^①。但其始终未被委任为“总书记”，而且因其奉行“左”倾盲动错误，在1928年7月的六届一中全会上，被向忠发取而代之，后者“顺利地当选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兼中央常委会主席，成为中共历史上第一位工人出身的总书记”^②。同样，其也没有成为党的领导核心，因为其政治地位的提升主要是受当时共产国际选拔干部片面强调工人成分的影响而不是基于其自身的能力，而且，事实上，在这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党的实际负责人是周恩来。^③1930年6月至9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和1931年1月至1935年1月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致使当时的中共领导人最终成为短暂的历史配角。与领导人的频繁更换^④对应的则是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左”“右”错误频发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起起落落，这一局面在遵义会议上得以初步改变，并以党的七大最终选择毛泽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作为党和红军生死攸关的历史性转折点，遵义会议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即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全权负责红军的军事行动，迅速摆脱了红军继长征开始以来的被动局面，更具深远意义的则是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虽然张闻天代替博古负责总指挥成为名义上的党内最高领导者，虽然毛泽东最初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的辅助者”，“虽然排名不在第一位，但却成为实际上的决策者”^⑤，因为他的多数意见的正确性而被广泛采用，而六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进一步确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尽管在有的时候处于少数，但他仍发挥了坚定的核心作用”^⑥。例如，1940年5月30日在延安举行了“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开学典礼大会，王明在讲话中称赞毛泽东是“全党团结的核心”、“是公认的领袖”^⑦。而中共七大选举产生的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委员会，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等五人组成的中央书记处是具有很高威信、能够团结全党的坚强的领导集体，标志着正式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正如邓小平在1989年郑重指出的：“我们党的历史上，真正形成成熟的领导，是从毛刘

①②金一南：《苦难辉煌》，北京：华艺出版社，2008年，第295、295页。

③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第111页。

④除了党的最高领导层和领导核心大浪淘沙式的选择性更换外，领导职务的称谓和职权也不断调整。党的一大“书记”成为最高领导称谓；党的二大和三大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机构仍然是中央局，负责人则称“委员长”；四小时又改称“总书记”；党的五大还选举了中央总书记，延安时期则第一次使用了“主席”这一称谓；而到了1956年召开的党的八大上，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被分开，“主席”和“总书记”两个称谓并称。

⑤廖心文：《中国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形成过程研究——兼谈毛泽东的核心地位是怎样确立的》，《党的文献》2012年第1期。

⑥黄一兵等：《大决策·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探踪》，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87页。

⑦水新营：《中共五大书记格局是怎样形成的？》，《史事本末》2015年第39期。

周朱这一代开始”^①。

溯源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核心的确立历程,历经了革命战争年代的烽火战乱和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日渐成熟的中国共产党以丰富的斗争经验和高超的领导能力为主要标准,最终理性慎重确定了毛泽东的核心地位和领袖权威,而之后高歌猛进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也充分证明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和稳定的中央领导核心的关键性作用,即“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一代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使党获得了整整30年的稳定”^②,而且“领导核心”的普遍使用和广泛流传也是自此开始的,同时也开始更加强调树立核心和注重“好班长”的“领头雁”作用。

2. 新时期至十八大之前党的领导核心确立的总体历程和基本经验。面对百废待兴的新中国、面对首次成为全国性执政党前所未有的治国重任、面对任弼时因病早逝后领导机构的完善重组,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始着手从军队和地方抽调年富力强的同志到中央各岗位工作,其中虽然也有“高饶事件”的波折,但总体是顺利地达到了预期目标,特别是党的八大在七届二中全会产生的五大书记中的四人外,又增加了陈云、林彪和邓小平三人,承继了七大选出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加入了新生力量,储备了优秀人才,做好了新老交替的重要准备,更为重要的是选择邓小平进入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奠定了第二代领导核心的政治基础。

随着党内政治生活逐渐偏离民主集中制和正常运行轨道,曾先后被确定为接班人的刘少奇和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非正常离世,而在“文化大革命”结束的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先后逝世,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仅剩已经靠边站的陈云和被再次打倒的邓小平。此时,如何彻底扭转十年内乱造成的严重局势使中国从危难中重新奋起,如何引领中国走向世界追赶时代潮流,如何带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开创一条新路,简而言之就是“文化大革命”后中国向何处去的重大使命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产生拨乱反正的领导核心。而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却因“两个凡是”等迟滞了历史进程,造成了“文革”后两年徘徊中前进的局面。正是在此背景下,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征程中,邓小平逐步走上历史舞台,成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1976年撤销的邓小平的一切职务,在十一大上又当选为党中央副主席,1978年3月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选举邓小平为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在1978年11月至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作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为实现伟大转折奠定了重要基础。因此,虽然十一届三中全会中担任中央主席的是华国锋,但事实证明党的指导思想和路线决策均采纳了邓小平的意见,邓小平同志实际上已经成为党中央的领导核心,而在1981年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而分别由胡耀邦和邓小平接任。因而,“在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去世两年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开始形成”^③的认识还是符合历史进程和逻辑事实的,后来邓小平同志也郑重提出,“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④

虽然后来领导集体中出现了波折和问题,1982年十二大选出的胡耀邦和1987年十三大选出的赵紫阳在执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上犯了原则错误,最终没有“站得住”,甚至出现了1989年春夏政治风波,但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支持下,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选举江泽民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在十三届五中全会上,邓小平辞去中央军委主席,完成了以他为

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98页。

②黄一兵等:《大决策·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探踪》,第189页。

③本书编写组:《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史》(下册),北京:新华出版社,2012年,第428页。

④《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第310页。

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向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接续,并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高度强调确立以江泽民为党的核心地位的重要性。他认为,正是“在历史上,我们有毛主席这个核心”,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党才能在斗争和错误出现的情形下屹立不倒,“这几年我们出现了两个领导人更迭以及通货膨胀这样的问题,因为有个核心,解决起来就比较容易。江泽民同志应该成为你们这个集体的核心”^①。“我认为,确定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是我们全党做出的正确的选择”^②。而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也完全昭示,邓小平和江泽民第二代和第三代党中央领导核心的确定使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有了稳步运行的坚实基础,极大减少了政治阻碍和影响大局稳定因素的滋生,保证了国内外环境的长期安定,实现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在党的十六大上,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平稳交接,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引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奋力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到新的发展阶段,其治国理政的十年被科学概括和高度评价为“励精图治的十年,经受考验的十年,不懈奋斗的十年,伟大成就的十年,举世公认的十年”^③。

二、十八大以来党的领导核心确立的现实要求的综合考量

重提“核心”、正式明确“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是时代的召唤,是党、人民、国家赋予的使命,是历史经验和理论渊源在新起点上的应用,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承前启后的必然要求。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起点”要求确定习近平党的核心领导地位。习近平同志郑重指出:“党的十八大精神,说一千道一万,归结为一点,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人民长期实践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这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学说和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的辩证要求。就根本性质而言,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近40年的持续快速发展,取得的辉煌成就初步改变了中华民族、中国社会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一贯结论和科学定位,也是对我国发展阶段的清醒认识和长期坚持。但也必须敏锐地看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出现的许多新情况和新变化,必须看到因巨大量变引起的部分质变而显示出的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在十八大结束后不久的十八大精神学习专题班,在坚持“三个没有变”的同时,习近平同志高瞻远瞩地指出“三个前所未有”,即“前所未有地接近梦想、前所未有地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前所未有地拥有实现梦想的能力和条件”,并强调必须将“三个没有变”和“三个前所未有”辩证结合才能科学判断和准确把握我国社会的具体国情。以之为基点,在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完成近现代两大历史任务的基础上,应该树立起更为科学而形象的发展蓝图并设定阶段性历史节点。

在新的发展阶段,仍然要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才是硬道理”,如何看待经济速度、结构和动能发生的新变化、在坚持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的同时如何全面推进改革、在经济全球化潮流中积极对外开放的同时如何更好地参与世界经济合作、在十五大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基础上如何全面依法治国、在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社会迅速进步的基础上如何更好地实现共享和共同富裕、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基础上如何全面从严治党进一步提升党建科学化水平、在精神文明建设文化强

^{①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9、334页。

^③胡鞍钢:《畅谈党的十八大之三:如何实现领导人的新老交替》,《国情报告》2012年第十五卷,第496—523页。

国建设扎实推进的基础上如何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多元社会思潮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以非凡的政治智慧、卓越的担当精神、高超的领导艺术、真挚的为民情怀,积极落实各项战略谋划,“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协调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有序前进、主动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在国际事务中展现了大国领导人的风范担当,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气魄,提升了中国的制度性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以开创性精神做了许多过去想做、能做而做不了的事,不再停留于“顶层设计”这一概念,而是前所未有、所向披靡地打出一套“组合拳”,取得一系列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成就,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新发展。正是因为习近平同志初步解决和努力推进这些党的领导核心必然面对也必须解决的时代课题,才在十八届六中全会上成为全党全军全国各族群众所望所归的共同选择。

其次,“新长征”路上“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协调推进要求确定习近平党的核心领导地位。虽然环境、条件、任务、力量等多方面有很大差异,但较之当年的红军长征相比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经走过的新长征之路,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同样是开创性、艰巨性和复杂性的,而且其程度更是前所未有。因而,为了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为了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必须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因为其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把握我国发展新特征而确定的治国理政新方略,是新的时代条件下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抉择。

作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大战略目标、居于引领地位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五位一体全面进步的小康,是覆盖领域更全面的小康,是惠及全体人民的小康,是覆盖人口更全面的小康,是城乡区域共同发展的小康,是覆盖区域更全面的小康。其中最难做到的就是“全面”,难在要做到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特别是作为拥有13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要到2020年实现全国全部70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的整体性脱贫并在此基础上使全体人民都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在战略机遇期发展重大变化的当下,面对叠加性矛盾、系统性风险和颠覆性错误,在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取向的同时处理好公平与效率、先富和共富的关系,在利益多元诉求多样社会分化摩擦加剧的分配格局中以人民为中心,以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并在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基础上的共享,是前所未有的现实挑战,只有坚持共同富裕原则的共产党,只有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领导核心,才能完成这前无古人的历史使命。

作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发展动力、具有突破性和先导性关键环节的全面深化改革,是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30多年改革开放的继续和深化,是对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和重要法宝的应用和创新。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当前的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推进改革的复杂程度、敏感程度、艰巨程度更为突出,啃硬骨头和涉险滩的任务更为迫切,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更难把握,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的辩证关系更难协调,因此更加强调改革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协同性,要求全面深化改革,勇于突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勇于突破体制机制的顽瘴痼疾,这样的攻坚战必然触及既得利益和得罪人,因而必然需要在“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的理念上产生有智慧、有勇气、有胆识、有担当的领导核心,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紧迫感、最大限度集中全党全社会智慧并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从而争当改革的旗手、促进派和实干家。

作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保障、兼具框架轨道理念方法的全面依法治国,是满足人民群众对幸福安康生活和国家长治久安期望的基本方式,是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制度化方案、实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的重要途径,是通过引领、规范、促进、保障等作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

路径,是跳出历史周期率走好中国道路的必然选择。如何解决与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直接相关的人民内部矛盾、其他社会矛盾、党风政风不正之风和影响改革发展稳定的问题,如何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如何共同推进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如何一体化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如何解决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权大还是法大”、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关系,如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等全面依法治国的系列问题都需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都需要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领导核心和模范人物。

作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根本保证,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优势的全面从严治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不犯颠覆性错误坚持正确方向的保证,是坚持党的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领导决策核心从而实现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地位的必由之路,是经受“四大考验”克服“四大危险”保持先进性、纯洁性和提升执政能力的现实选择,是在“新赶考”征程中实现“打铁还需自身硬”的科学途径。如何将全面从严治党更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如何实现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有机结合,如何实现思想、组织、作风、纪律和反腐倡廉五位一体建设协调推进,如何在解决突出问题的同时实现标本兼治,如何解决影响党内政治生态的党内政治生活和党内监督的突出问题,都需要选择具备崇高信念信仰、深沉忧患意识、顽强意志品质、崇高人格魅力和高尚形象的领导核心。

上述分析说明,种种的考验和要求都需要一个强大成熟的领导集体、呼唤一位领导核心的存在、盼望优秀的领袖核心来凝聚力量,稳定全局,协调各方,统筹发展,而时代和人民选择习近平同志成为全党的领导核心是因为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关键性因素,党的领导核心通过影响党的宗旨性质、思想路线、方针政策从而关系“五位一体”总布局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领域的基本问题和具体课题,这已为十八大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成就所证实并将继续得到充分印证。

三、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地位的科学维护

习近平核心地位的确立是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共同要求,是理论、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必须在厘清辩证关系的基础上探寻科学路径,“以期达到‘资政镜鉴、利民盛世、和谐兴邦’之目的。”^①维护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地位,必须处理好以下关系。

第一,处理好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与习近平同志的核心地位之间的关系。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保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而习近平同志是党中央和全党的领导核心。党组织的领导核心是习近平同志的领导核心地位的前提、基础和目的,习近平同志的核心地位是党组织的领导核心的表现、保证和路径,两者在协同中共进。虽然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为历史和人民所选择并成为现代中国的领导核心的原因是复杂的,但在不同时期选择了正确的领导核心并积极维护其核心地位毋庸置疑是其中的关键因素。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不同时期在全局事业中的领导核心地位必然要求也必须选择德才兼备的领导人物承担起更为重要的职责以完成使命,而领袖人物基于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的政治平台、丰富的人力资源和优良的历史经验又有利于自身综合素质的提升,并在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完成阶段性历史使命的实践进程中获得拥戴而成长为党的领导核心。因此,十八届六中全会确立习近平的领导核心地位也是同于上述逻辑。

第二,处理好党员的主体地位与习近平的核心地位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群

^①杨嵘均:《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历史认知、实践定位与哲学意蕴》,《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众、阶级、政党、领袖的科学论述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个人崇拜的教训是处理好党的领袖权威和党员群众关系的理论指南和现实指针。究其实质，两者是共存互进的统一体，全体党员是党的领袖发挥核心作用最为坚实的力量源泉、基础、依靠和动力，而党的领袖是全体党员主体作用发挥最为坚强的方法引领、政治保证、目标设定和蓝图提供。一方面，必须高度重视习近平的领导核心作用。“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否认过英雄的作用。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认为这种作用是相当大的”^①，因为“在多数情况下，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而且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进程也证明“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②，“这一切，如果没有中央的权威，就办不到”^③。另一方面，强调无产阶级领袖的权威并不是要过分夸大个人作用、讲个人凌驾于集体之上，而是要尊重广大党员的主体地位，保障党员民主权利，发挥其主导性和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党员是党的肌体的细胞和党的行为主体，党的先进性最终要靠党员的先进性来体现，而“领袖的作用，也正在于通过本阶级一切肯动脑筋的分子所进行的长期的、顽强的、各种各样的、多方面的工作，获得必要的知识、必要的经验、必要的政治敏感，来迅速而正确地解决各种复杂的政治问题”^④，总之，迫切需要具备非凡的政治智慧、卓越的担当精神、高超的领导艺术、真挚的为民情怀的领袖，需要发挥习近平同志的领导核心作用，更需要正确处理好领袖、党中央、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关系。

第三，处理好民主集中制与习近平的核心地位之间的关系。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是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开展的重要制度保障，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环节，因而，“民主集中制执行得不好，党是可以变质的，国家也是可以变质的，社会主义也是可以变质的。干部可以变质，个人也可以变质”^⑤。一方面，必须无条件坚持“四个服从”，即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树立政治意识、看齐意识、纪律意识，强化规矩意识和党章意识，严明党的纪律特别是政治纪律，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政治行动与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一致，实现组织、行动和意志的完全统一，充分发挥统筹各方意志、吸收全党智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实现全党的统一协调。另一方面，要正确认识民主对集中的重要价值，即广泛的民主是正确集中的前提，必须在党内坚决贯彻群众路线，反映和表达党员和党组织的意愿和主张，尊重和保障党员和党组织对党内事务的决策权、管理权、监督权、选举权等所有民主权利，以“三个区分开来”鼓励支持包容地方党组织和党员的实践探索，从而最大限度调动广大干部和全体党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习近平党的核心地位不仅需要会议决定和文件规定，更需要治国理政实践体现和实现，应该在处理好上述三对关系的基础上立足十八届六中全会、“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协调推进和“四个意识”的树立与强化。

第一，立足“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协调展开和“四个意识”的树立来维护习近平同志的核心地位。习近平同志的核心地位是十八届六中全会正式确定的，也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协调推进的必然要求。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正式形成并逐步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全面深化改革”为主题重点解决总目标、正确方向和重大关系，十八届四中全会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为主题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法治体系和重点任务，十八届五中全会

①《斯大林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95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77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8页。

④《列宁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0页。

⑤《邓小平文选》（第1卷）《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03页。

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主题解决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新理念、新任务和新政策，十八届六中全会以“全面从严治党”为主题解决党内政治生活和党内监督问题，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四次中央全会都直指党的先进性和执政能力，要求解决好新形势下党的领导问题，特别是树立起党中央的领导核心和权威。而与此同时，习近平党的核心地位是树立和强化“四个意识”的自然逻辑。“四个意识”是中国政党政治和国家治理的标志性阶段。所谓政治意识侧重强调政治头脑、政治立场、政治信仰、政治信念、政治观察力和政治鉴别力；所谓大局意识侧重强调站在党的整体和国家大局层面看问题、看问题、执行政策、解决问题，通过政令畅通做到全国一盘棋；所谓核心意识侧重强调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的核心领导地位、党中央的政治权威和习近平同志的核心地位；所谓看齐意识侧重强调经常、主动、全面向党中央、向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向党的重要会议的精神、向各项决策部署看齐，强调在公认标准上的步调一致。简言之，“四个意识”就是为了增强团结统一、凝聚发展动力，而核心意识是重中之重，就是要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地位和权威，就是高度的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基础上的深刻感情认同、充分思想信赖、坚决政治维护和自觉组织服从。

第二，立足学习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和党章党规维护习近平党的核心地位。在意识逐步树立的基础上，围绕思想建党学习系列讲话保持认知一致、围绕制度治党学习党章党规保持行动统一。一方面，学习以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为核心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新成果。既要掌握其理论定位和实践价值，面对新的历史起点上理论需求的新要求、多元社会思潮中意识形态的新局面、国际力量和世界格局历史性调整下中国方案的新应对，站在改革攻坚期和发展转型期的关键时间点、国际格局大变革的关键空间点，十八大以来的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发表系列重要讲话，形成诸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成为新的历史起点上实现新的奋斗目标的基本遵循和治国理政的行动纲领，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成为21世纪鲜活的马克思主义，蕴含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和方法论意义。更要把握其逻辑体系和核心内容，虽然其一般以单篇讲话的形式呈现，但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为中心、涉及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反映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 展规律，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等，是政治立场、完整观点、科学方法、价值追求、思想风范、为民情怀的问题群和答案群、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有机统一。另一方面，学习党章党规以规矩纪律保持行动上维护习近平为核心的领导地位。在继承思想建党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十八大以来更加强调更具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的制度，将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贯彻到治国理政的全过程、落实到“四个全面”的大棋局，反映到党的建设领域，就是用制度治党，依法依规治党。从制度、纪律、规矩三方面着手，其中制度建设是关键，严明纪律是保障，严守规矩是要求，三者统一于全面从严治党的系统工程之中，是实现全面从严治党的三大法宝。继续制定完善党内法规，构建以党章为根本、若干配套党内法规为支撑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①，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地位和权威就必须坚持执行领导核心的决定，必须树立起规矩意识和党章意识，把党的纪律特别是政治纪律挺在前面，以铁的纪律严惩挑战党中央权威和核心地位的各种非组织活动、小山头、小圈子和小团伙。

^①近年来制定的党内法规包括：2013年发布的《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2013—2017年）》《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等等。